

清宫外国画家谈

聂 崇 正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封闭式的，在它们久远的发展历史中，除去自身的变化外，同时也在不间断地吸收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东方和西方都是如此。当然，这种交流的媒介不尽相同，有的是以战争，有的是以贸易，有的是以宗教，但结果却是差不多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交通的频繁，这种文化交流的范围也随之越来越扩大，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从公元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的许多国家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兴的资产阶级有着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活力，他们想了解世界，要寻求市场，要获取资源和劳力，于是众多的欧洲人陆续到他们原先认为无比富裕和充满神秘感的东方，来看个究竟。来的人当中有国家的使臣和商人，但更多的则是欧洲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使臣和商人，来去匆匆，虽然从他们携带来的礼品和商品中会有一些数量的绘画艺术品，但毕竟时间较短，影响有限；而那些传教士，他们大都受到过很好的教育，除去宗教神学外，还熟练掌握了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某些门类。更主要的是这部分欧洲神职人员由于职业和身份，都具有为某种信仰而献身的精神。这种献身精神使得许多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并且长期居住在这里，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礼仪，传播欧洲的文化和艺术，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终年在异国他乡。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就是靠这批欧洲的传教士。

欧洲的传教士中，有一部分人，原先曾经学习过绘画，掌握了西方的人物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的技艺，来到中国以后，即以此一技之长博得皇帝的欢心，进入宫廷为皇室服务，成了中国的宫廷画家。他们在宫廷里，不光自己画了很多表现重大事件、人物和花鸟走兽的作品，而且还将西洋绘画的技法传授给在宫中供职的中国画家，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国画家在

他们的作品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西洋绘画的因素。其中注重光影的描绘以及焦点透视造成的深远效果等新的画风，都在很多清朝宫廷画上得到反映，使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绘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种特色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清朝宫廷绘画新风格的出现，和欧洲传教士画家在宫廷里的艺术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对于中西绘画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促进当时东西方两大绘画体系的相互了解，无疑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应当给予肯定。过去曾经对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过多注意了消极因素，对他们的积极贡献重视不够，甚至不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具体的人，统统将他们视为文化间谍，一概加以否定，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这部分来华的传教士画家，如果拿当时欧洲画坛的绘画水平来衡量的话，也就是把他们放在欧洲绘画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一下比较，那末他们都算不上是第一流的画家，有的人甚至连三流画家都排不上。另外，他们又长时间离开故土，在中国进行传教和艺术创作活动，所以欧洲的绘画史上很少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作品；而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又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创作的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的面貌有较大的差别，再加上门户和保守思想的偏见，所以也很少提到这部分画家。

下面就曾在清朝宫廷里供职的欧洲画家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这些画家中，以意大利人郎世宁的名气最大，他来华时间较早，在中国经历了康熙（玄烨）、雍正（胤禛）、乾隆（弘历）三个皇帝，创作了大量作品，其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欧洲传教士画家。（因为本期对这位画家另有专文，故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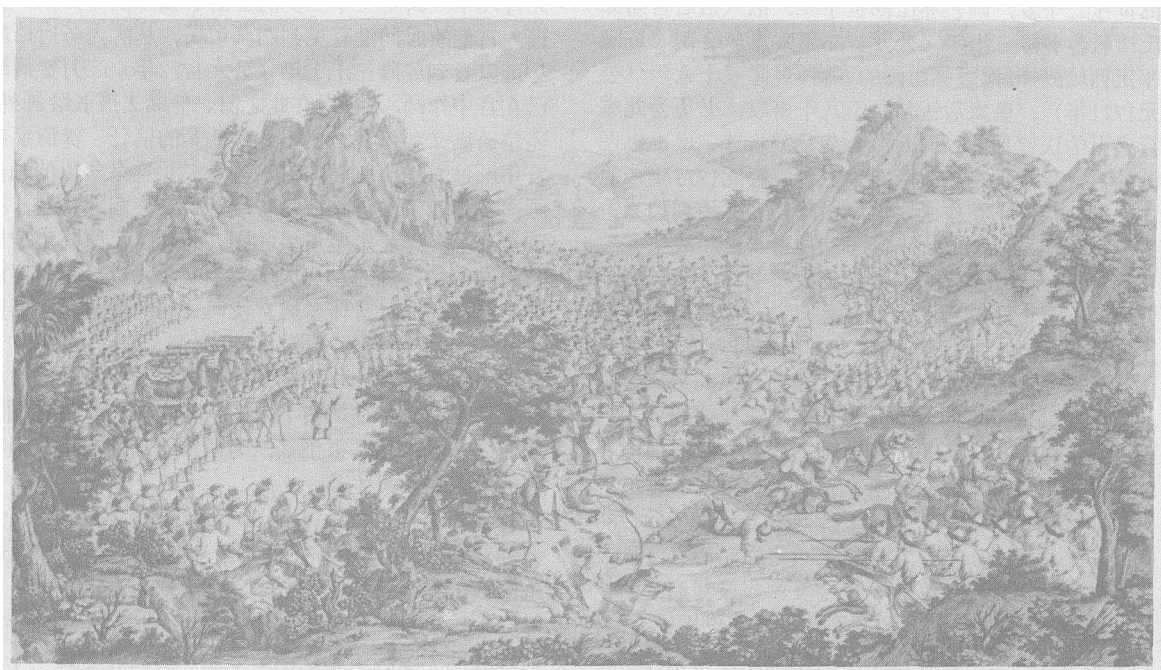
马国贤，原名Matteo Ripa，意大利人，公元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爱波里镇，

其父是位医生。他十五岁那年就献身宗教，并立下了到东方传教的志愿。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马国贤从荷兰的鹿特丹港启程，乘船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于公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到达澳门，然后北上京师。在北京马国贤先习中文，随后在宫廷中供职。他能雕、琢、绘、塑，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中国的宫廷画家将承德避暑山庄中的山光水色绘成三十六景，由马国贤根据原画稿刻制成铜版，印出了一套《御制避暑山庄图咏三十六景》的铜版画。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地理史上第一部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将欧洲的铜版画技术介绍到中国，马国贤是先驱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马国贤带了四名中国学生回意大利，临行前，雍正皇帝胤禛赏赐骏马、贡缎和瓷器等物。马国贤年龄比郎世宁小，但来华时间早于郎世宁，留居中国十三年，他回国的时候，郎世宁则刚刚进入宫廷。马国贤于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去世。

王致诚，原名Jean Denis Attiret，法兰西人，公元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生于法国多纳。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画家。王致诚三十六岁时（公元1738年，乾隆三年），由欧洲天主教耶稣会法国传道部派遣来华。关于他的来华，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据说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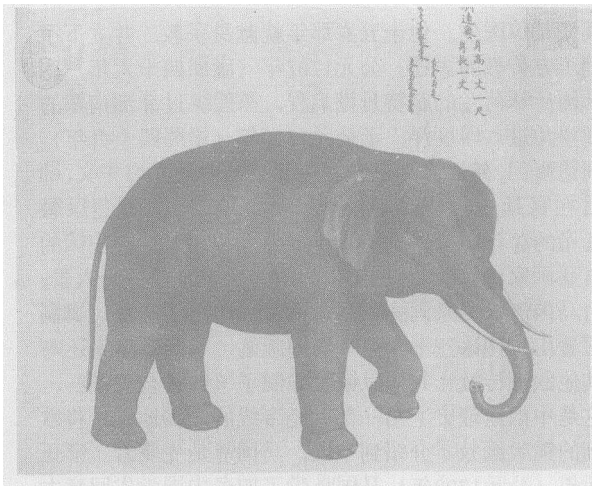
于郎世宁来华后，得到皇帝的宠幸和重视，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羡慕和忌妒，为了抵销郎世宁的影响，于是耶稣会法国传道部就从其属下挑选了一名擅长绘画的传教士，将他派往中国，此人便是王致诚。王致诚到达北京后，将他所画的西洋风景羊皮扇面画等呈献给乾隆皇帝弘历，弘历看后颇加赞赏，便将他留在宫里作画。根据清内务府档案的有关记载推测，他初来时汉名可能叫张纯一，约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更汉名为王致诚。他在宫中奉命画过油画挂屏；蒙古族厄鲁特部内附时，王致诚和郎世宁、艾启蒙等画家一起被派往承德避暑山庄，为蒙古族首领画肖像，并以此为素材，和郎世宁等共同创作了表现这一重大事件的大型历史画。在我国版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乾隆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组画，王致诚也参与了其中数幅草图的绘制工作。王致诚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古老的东方园林艺术极为推崇和赞扬，他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对皇家园林圆明园赞不绝口。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王致诚去世，终年六十六岁。王致诚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十骏马图》册一件，共十页，每页上画一匹蒙古族或维吾尔族首领进献给乾隆皇帝的骏马，画幅虽然不大，但画得十分精细。王致诚用短而密的细线来塑造马匹的形象，造型很准确，皮毛的质感也很强，和传统中国绘画以连绵线条见长的风格迥异。从这件作品看，王致

安德义 呼尔璊大捷 《乾隆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组画之一





艾启蒙 十骏犬图册之一



贺清泰 象图册之一

诚具有很坚实的素描功底，技艺确实不在郎世宁之下。

艾启蒙,原名Ignatius Sicklart,波希米西(今属捷克斯洛伐克)人,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生,公元1736年(乾隆元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取汉名艾启蒙,字醒菴。同年,艾启蒙进入宫廷供职。他小郎世宁二十岁,画艺亦比郎世宁差,故入宫后曾向郎氏请教。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奉命绘制《乾隆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画组画的底稿;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皇太后钮祜禄氏八十寿辰,弘历为此举行盛大的庆贺典礼,同时命令艾启蒙将这一盛况以图画的形式保存下来;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一天,艾启蒙正在作画,恰好乾隆皇帝弘历到如意馆来,见到他持画笔的手不断颤动,说“卿手战栗矣”,艾启蒙答:“无妨也,臣尚能作画也”,弘历又问:“卿年几何?”答:“七十矣”,弘历很高兴地说:“何不早言。卿不知郎世宁七十时,朕誉为祝寿。朕亦将为汝贺也。”于是于该年九月十八日举行庆典,邀请在京的外国传教士参加,并由其中的安国宁陪同艾启蒙前往圆明园,接受皇帝的召见,召见后还得到朝服及御题“海国耆龄”匾等赏赐品。然后乘坐八抬肩舆,乐队、官员等随行,遍游全城,荣耀之极。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艾启蒙卒于北京,享年七十三岁,清宫特赐银二百两作为殡葬之资。《石渠宝笈》收录艾启蒙的作品共九件,题材大都是走兽翎毛,如《八骏图》大幅、《十骏犬图》册等,画法虽然很工细,但动物神态较

板滞,仅得其皮毛。如果说郎世宁、王致诚的作品是对着动物园里的活物写生而成的话,那末艾启蒙的作品就是对着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而描画的,二者水平的高低是比较明显的。

贺清泰,原名Louis de Poirot,法兰西人,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生于鲁兰,后来长期生活在意大利,公元1756年加入耶稣会。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时年三十五岁的贺清泰被派到中国来,他进入宫廷的时间没有见到明确记载,从清内务府档案中可以看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二月贺清泰已在宫中作画,入宫当在此之前。他除去擅长绘画外,还精通满文和汉文,颇得乾隆皇帝的信任。贺清泰在宫中画过人物、鸟兽和山水多幅,并且奉命以油画作画;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和艾启蒙一起,帮助修改《乾隆平定金川得胜图》的画稿,原稿是中国宫廷画家徐扬画的。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贺清泰年事已高,且身体多病,便向皇帝颉琰请求准其回到欧洲去,但因病势沉重,未能成行,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卒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贺清泰的绘画技艺较平常,从他流传下来的《黄鹿图》、《白鹰图》等作品来看,用笔很细腻,为西洋绘画的技法,但鸟兽的形象欠活泼生动。

安德义,原名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意大利罗马人,生年不详。他是欧洲奥斯汀会的传教士,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进入清宫廷内供职。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安德义也参加了《乾隆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组画草图的绘制。大约在乾隆三十八

年(公元1773年),安德义离开了宫廷,任天主教的北京主教,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他经常遭到法国及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的非难。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安德义卒于北京。安德义的姓名不见于胡敬的《国朝院画录》一书,目前尚未发现有他署名的独幅作品。虽然我们从内务府档案内看到他在宫中画过挂屏的记载,但实物已不可寻见。现在仅知《乾隆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组画中“库陇癸之战”、“乌什酋长献城降”、“呼尔瑞大捷”、“伊西尔库尔淖尔之战”、“拔达山汗纳款”、“郊劳回部成功诸将”等图的稿本是出自安德义的手笔。仅从这几幅画来看,构图比较平板,人物动作雷同,画艺平平。

潘廷章,原名Joseph Panzi,意大利人,耶稣会修士,在欧洲时就颇有声望。他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抵达中国,二年后进京,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推荐,进入宫廷作画。我们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的内务府档案中就发现有潘廷章活动的记载。他在宫中奉命为乾隆皇帝弘历画油画肖像,档案里还多次提到他在宫中用油画画像,可见潘廷章是一位擅长作肖像画的油画家,但是他的油画作品至今没有发现。潘廷章一方面在宫廷内供职,另一方面在官

廷外也有绘画创作活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他所画的《达尼厄尔先知拜神图》受到了蒋友仁的推崇,认为其精妙不在郎世宁之下。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潘廷章为葡萄牙传教士布道的天主教东教堂画了一幅高十一尺、宽八尺的《圣母像》。潘廷章在清宫廷内供职持续到乾隆末期,他大约卒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之前,确年不详。潘廷章的作品目前所见仅有半幅,即与贺清泰合作的《廓尔喀贡马象图》卷,这件作品画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如果从画上署名先后看,可能前面二象为贺清泰所绘,而后面的二马则出自潘廷章的手笔。另外乾隆皇帝弘历晚年的肖像画中,可能有潘廷章画的,但按照惯例,这些画上是不会署作者姓名的,所以现在也无法确指哪件作品为潘廷章所画。

清朝乾隆以后,虽然还是不断有欧洲传教士到东方来,但他们在宫廷里供职作画的现象却消失了。欧洲画风影响的范围大致局限在能接触到这些欧洲人的中国画家,时间仅限于康、雍、乾三代的一百年左右。由于各种原因,欧洲风格的绘画并没有能够在中国推广开来,它只能看作是中国绘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王致诚 十骏马图册之一

